# 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的拉动效应

#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寇明栋1 张 勇2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北京 102401;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随着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中国对拉美经济的积极影响日益加深。有鉴于此,测度和分析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对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在世界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 OECD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效应。研究认为:第一,1995—2018年,拉动率增长显著,中国最终需求每增长 1% 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由 0.001 4%提升至 0.025 3%,提升了 17倍,且 2018年中国的拉动率在拉美所有外部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第二,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中价值链依存度整体较高,上升趋势明显,在 2000年之后始终保持在 80%以上;第三,中国最终需求是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将通过内循环到外循环有效拉动拉美经济增长。

【关键词】需求拉动效应;中拉经贸合作;全球价值链;新发展格局;拉美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24)05-0001-1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其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中居重要地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sup>①</sup>,2021年拉美国内生产总值约5.1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5.34%。拉美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地之一,还拥有丰富的能矿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煤炭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地。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生产与消费市场,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在全球价值链中与拉美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新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合作发展迅猛,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显著增长、金融合作不断深化、技术合作

不断加强等。而且,近年来中国与拉美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克服了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不断推动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2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经济联动愈发明显。大量研究者发现区域之间能够通过贸易、投资、技术等多种渠道影响彼此的经济增长<sup>11</sup>。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在 21 世纪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对拉美贸易出口与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sup>12</sup>。为了更精确地了解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研究者们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概念。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一个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对其他区域的具

收稿日期: 2023-10-07 修返日期: 2023-12-07

作者简介: 寂明栋(1994-), 男, 汉族, 甘肃白银人, 博士在读。研究方向: 拉美经济。

张 勇(1977-), 男,汉族,山东安丘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拉美经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内生及外源性危机对拉美国家的影响及其应对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0BGJ07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与拉丁美洲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研究,项目编号: 21AGJ013。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体影响指数。根据研究主体的不同,有关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主流研究有两类:一类研究区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类研究多使用简单的加权平均测算方法,通过世界 GDP 增长中区域经济增长的比例来计算贡献率<sup>[3]</sup>;另一类研究区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可称作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细分区域间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研究,有三种主 流的测度方式。第一种方式源自 Fleming [4]和 Mundell [5] 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Mundell-Fleming), 并由 Douven 和 Peeters 将其扩展至多国层面。该模型基 于宏观层面的一般均衡,模拟一国经济增长对其他 国家的溢出效应[7]。但由于 Mundell-Fleming 所需的 假设过于严格, 且均衡模型的参数是人为估计的, 所以结果往往与现实世界的经济趋势存在偏差。第 二种测度方法源自 Sims<sup>[8]</sup>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该模型最初被用来分析单一经济体受外 部冲击时的响应程度,后经 Garratt 等<sup>19</sup>拓展为全球 向量自回归模型 (GVAR), 使其用于分析多个经济 体之间的经济联系[10]。GVAR 模型能够通过时间序 列数据,模拟一国受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冲击的响应 程度, 但是 GVAR 模型无法剥离其他外部冲击对该 国产生的影响, 所以得到的结果也并不精确。第三 种测度方法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投入产出模型。全 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最早由 Gereffi<sup>[11]</sup>提出,是对全球 商品链概念的拓展。目前,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 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采购、研发、 设计、生产、分销、消费、服务等多个环节、构建 一个高度复杂的生产与分配网络,将不同地区的生 产者与消费者紧密联系起来。投入产出模型用全球 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数据 构建投入产出表,对投入产出表进行矩阵运算得 到经济体之间的拉动率。这有别于前两种测度方 法,不用模糊的参数估计和拟合回归,仅凭区域 间的真实贸易数据计算拉动效应,得到的结果精 确直接。

生产网络模型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日趋成熟,部分研究者开始用生产网络模型分析区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王继源等<sup>[12]</sup>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对

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张同斌等[13]基于世界投 入产出表的中间品投入视角,测度了中国制造业 对欧元区及北美、东亚、俄罗斯等地区经济增长 的增加值贡献率;倪江飞等[14]用世界投入产出数 据库,从增加值角度测算了中国对外部国家和全 球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 戴翔[15]基于投入产出模 型,用产出拉动框架测度了中国产出增长对外部 国家的拉动率与实际拉动量; 古柳和戴翔[16]在戴 翔[17]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 计算了中国产出增 长对世界经济的拉动率; 丁纯和蒋帝文[18]将区域 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拓展为拉动效应和推动效 应,分别测度了德国对维谢格拉德四国(Visegrád Group)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与推动率;黄仁全和李 村璞[19]基于中国"双循环"视角,测度了中国在 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方面对其他国家的拉动效应 和推动效应。

然而,目前针对拉美经济增长拉动率的研究仅限于中国经济增长对拉美的影响研究,缺乏对拉动率的具体测度、分析与分解。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拉美贸易出口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中国对拉美投资也促进了拉美经济增长<sup>[20]</sup>;少数学者认为,中国对拉美的贸易模式仍处于"出口产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初级贸易阶段,这种贸易模式加剧了该地区对于"资源诅咒"和去工业化的担忧,并且伴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制造业对拉美(尤其是墨西哥、中美洲)制造业产生了强烈的挤出效应,这可能会对拉美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产生影响<sup>[21]</sup>。

本文基于生产网络的投入产出模型,以全球价值链视角测度了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提供了一种计算最终需求拉动率的测算框架,通过跟踪增加值投入与最终产品需求,测度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后向拉动率;第二,本文根据区域间最终需求的拉动率提出分解方法,将拉动率的变化动力进行分解,剥离出对拉动率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第三,本文的实证研究,为进一步深化中拉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我国在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 一、模型设定、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与简化版的世界投入产出表

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是以全球生产网络为基础, 揭示全球经济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宏观经济学模型。 其核心工具是基于全球价值链而构建的世界投入 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s),该表表述了世界经济体之间商品、服务、投资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各国家与区域在宏观层面的联系与趋势,所以在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合并所有部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假设简化后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中有 g 个国家/区域,则如表 1 所示:

表 1	简化后的世界投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总产出	
		国家 1	国家 2		国家 g	国家 1	国家 2		国家 g	心儿山	
	国家 1	$Z^{II}$	$Z^{12}$		$Z^{lg}$	$F^{II}$	$F^{12}$		$F^{lg}$	$Y^{l}$	
中间投	国家 2	$Z^{21}$	$Z^{22}$		$Z^{2g}$	$F^{21}$	$F^{22}$		$F^{2g}$	Y <sup>2</sup>	
投 入	•••	•••	•••		•••	•••	•••				
	国家 N	$Z^{\mathrm{g}I}$	$Z^{g2}$		$Z^{ m gg}$	$F^{gl}$	$F^{g2}$		$F^{ m gg}$	Yg	
	增加值	Va <sup>1</sup>	Va <sup>2</sup>		Va <sup>g</sup>						
	总投入	$Y^{l}$	$Y^2$		Yg						

 $Z^{ij}$ 和 $F^{ij}$ 分别表示 i 国生产的被 j 国用作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的部分, $V^i$ 和 $Y^i$ 分别表示 i 国的总增加值和总产出。同时使用  $A^{ij} = Z^{ij}/Y^j$ 表示 j 国对 i 国的直接消耗系数,该系数反映了 j 国每增加 1 单位总产出需要消耗 i 国中间品的数量。以上各变量可以通过矩阵或向量分别表示为 Z, F, Va, Y, A, 其中:

$$Z = \begin{bmatrix} Z^{11} & \cdots & Z^{1g} \\ \vdots & \ddots & \vdots \\ Z^{g1} & \cdots & Z^{gg} \end{bmatrix}; \quad F = \begin{bmatrix} \sum_{j=1}^{g} F^{1j} \\ \vdots \\ \sum_{j=1}^{g} F^{gj} \end{bmatrix};$$

$$Va = \begin{bmatrix} Va^1 \\ \vdots \\ Va^g \end{bmatrix}^T; \quad Y = \begin{bmatrix} Y^1 \\ \vdots \\ Y^g \end{bmatrix}; \quad A = \begin{bmatrix} A^{11} & \cdots & A^{1g} \\ \vdots & \ddots & \vdots \\ A^{g1} & \cdots & A^{gg} \end{bmatrix}$$

根据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的行平衡关系,总产出 Y 可以被分解为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产出之和: Y = AY + F,将其变形可以得到:  $Y = (I - A)^{-1}F$ ,其中矩阵 I 为  $g \times g$  的单位矩阵,  $B = (I - A)^{-1}$  是列昂惕夫逆矩阵,也称作完全消耗系数矩阵,矩阵 B

中的元素  $B^{i}$ 表示 j国增加 1 单位最终产品需求所能直接或间接拉动 i 国总产出增加的比例。矩阵 B 具体为:

$$B = \begin{bmatrix} B^{11} & \cdots & B^{1g} \\ \vdots & \ddots & \vdots \\ B^{g1} & \cdots & B^{gg} \end{bmatrix}$$

定义向量 $V=\begin{bmatrix}V^1&\cdots&V^g\end{bmatrix}$ ,V表示 i 国单位 总产出的增加值系数, $V^i=\frac{Va^i}{V^i}$ 。

(二)分解与拉动率有关的增加值和最终需求

本文所研究的拉动效应为一国最终需求对另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价值链的投入产出模型中,可以表示为一国投入的增加值被另一国以最终需求形式吸收的部分。根据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平衡关系 Y = BF,参考 Koopman 等[22]和 Wang 等[23]所做工作,对 i国总产出 Y进行分解:

$$Y^{i} = B^{ii}F^{ii} + B^{ii}F^{ij} + B^{ii}\sum_{t \neq i,j}^{g} F^{it} + B^{ij}F^{ji} + B^{ij}F^{jj}$$

$$+B^{ij}\sum_{t \neq i,j}^{g} F^{jt} + \sum_{t \neq i,j}^{g} B^{it}F^{ii} + \sum_{t \neq i,j}^{g} B^{it}F^{tj} + \sum_{t \neq i,j}^{g} B^{it}\sum_{u \neq i,j}^{g} F^{tu}$$
(1)

将式(1)左乘 $V^i$ ,可将 i国的增加值分解为:

$$\begin{split} Va^{i} &= V^{i}Y^{i} = V^{i}B^{ii}F^{ii} + V^{i}B^{ii}F^{ij} + V^{i}B^{ii}\sum_{t\neq i,j}^{g}F^{it} \\ &+ V^{i}B^{ij}F^{ji} + V^{i}B^{ij}F^{jj} + V^{i}B^{ij}\sum_{t\neq i,j}^{g}F^{jt} \\ &+ V^{i}\sum_{t\neq i,j}^{g}B^{it}F^{ii} + V^{i}\sum_{t\neq i,j}^{g}B^{it}F^{tj} \\ &+ V^{i}\sum_{t\neq i,j}^{g}B^{it}\sum_{u\neq i,j}^{g}F^{tu} \end{split} \tag{2}$$

根据式(2)中最终产品的吸收国,提取出 i增加值由 j国最终产品吸收的部分:

$$V^{i} _{1}Y^{j} = \underbrace{V^{i}B^{ii}F^{ij}}_{(1)-RT} + \underbrace{V^{i}\sum_{t\neq i}^{g}B^{it}F^{tj}}_{(2)-GVC}$$
(3)

式(3)表示 j 国通过最终产品吸收 i 国增加值的部分,即 j 国最终需求对 i 国 GDP 的后向拉动值。其中: RT 为传统"李嘉图贸易",表示 i 国通过国内产出产成品,并由 j 国吸收所直接拉动的部分,该模式仅涉及最终产品的跨境活动; GVC 为涉及中间品贸易的全球价值链活动,表示 i 国向外部区域产出初始投入或中间品,中间品加工为产成品后由 j 国吸收所间接拉动的部分。

更进一步,基于对不同贸易模式的分解,可以 探究拉动率的价值链依存度。定义 *GVCP<sup>ij</sup>* 表示 *j* 国 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间接拉动 *i* 国经济的 依存度,价值链依存度的具体描述如下:

$$GVCP^{ij} = \frac{GVC^{ij}}{V^i _Y Y^j}$$
 (4)

## (三)拉动变化率的动力分解

基于上述拉动增加值,可以对拉动增加值的变化率进行分解,来探究外部区域对拉美经济增长拉动率变动的原因。首先,将式(3)代人 $\Delta V^{i}_{-}Y^{j}$ 中,可得:

$$\Delta V^{i} _{Y}^{j} = V^{i} _{Y}^{j} _{t+1} - V^{i} _{Y}^{j} _{t} = V^{i} _{t+1} B^{ii} _{t+1} F^{ij} _{t+1}$$

$$+ V^{i} _{t+1} \sum_{u \neq i}^{g} B^{iu} _{t+1} F^{uj} _{t+1} - V^{i} _{t} B^{ii} _{t} F^{ij} _{t} \qquad (5)$$

$$- V^{i} _{t} \sum_{u \neq i}^{g} B^{iu} _{t} F^{uj} _{t}$$

然后,可将 $\Delta V^i$   $Y^j$ 表示为以下两种形式:

$$\begin{split} \Delta V^{i} _{-} Y^{j} &= \Delta V^{i} B^{ii}_{t+1} F^{ij}_{t+1} + V^{i}_{t} \Delta B^{ii} F^{ij}_{t+1} \\ &+ V^{i}_{t} B^{ii}_{t} \Delta F^{ij} + \Delta V^{i} \sum_{u \neq i}^{g} B^{iu}_{t+1} F^{uj}_{t+1} \\ &+ V^{i}_{t} \sum_{u \neq i}^{g} \Delta B^{iu} F^{uj}_{t+1} + V^{i}_{t} \sum_{u \neq i}^{g} B^{iu}_{t} \Delta F^{uj} \end{split} \tag{6}$$

$$\Delta V^{i}_{-}Y^{j} = \Delta V^{i}B_{t}^{ii}F_{t}^{ij} + V_{t+1}^{i}\Delta B^{ii}F_{t}^{ij}$$

$$+V_{t+1}^{i}B_{t+1}^{ii}\Delta F^{ij} + \Delta V^{i}\sum_{u\neq i}^{g}B_{t}^{iu}F_{t}^{uj}$$

$$+V_{t+1}^{i}\sum_{u\neq i}^{g}\Delta B^{iu}F_{t}^{uj} + V_{t+1}^{i}\sum_{u\neq i}^{g}B_{t+1}^{iu}\Delta F^{uj}$$

$$(7)$$

最后,将式(6)和式(7)式相加,平均后可得:

$$\begin{split} \Delta V^{i} &= \frac{1}{2} \Delta V^{i} \left( B_{t}^{ii} F_{t}^{ij} + B_{t+1}^{ii} F_{t+1}^{ij} \right) \\ &+ \frac{1}{2} \left( V_{t}^{i} \Delta B^{ii} F_{t+1}^{ij} + V_{t+1}^{i} \Delta B^{ii} F_{t}^{ij} \right) \\ &+ \frac{1}{2} \left( V_{t}^{i} B_{t}^{ii} + V_{t+1}^{i} B_{t+1}^{ii} \right) \Delta F^{ij} \\ &+ \frac{1}{2} \Delta V^{i} \left( \sum_{u \neq i}^{g} B_{t}^{iu} F_{t}^{uj} + \sum_{u \neq i}^{g} B_{t+1}^{iu} F_{t+1}^{uj} \right) \\ &+ \frac{1}{2} \left( V_{t}^{i} \sum_{u \neq i}^{g} \Delta B^{iu} F_{t+1}^{uj} + V_{t+1}^{i} \sum_{u \neq i}^{g} \Delta B^{iu} F_{t}^{uj} \right) \\ &+ \frac{1}{2} \left( V_{t}^{i} \sum_{u \neq i}^{g} B_{t}^{iu} + V_{t+1}^{i} \sum_{u \neq i}^{g} B_{t+1}^{iu} \right) \Delta F^{uj} \end{split}$$

最终需求变动效应可以分为消费需求变动效应和投资需求变动效应,  $\Delta F^{ij} = \Delta F_C^{ij} + \Delta F_I^{ij}$  ,代人(8)中可将经济增长的拉动值具体分解为:

其中,增加值率变动效应为增加值投入改变引起最终拉动值变化的部分,表示 i 国参与 j 国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强弱;中间品投入结构变动效应表示 i 国与 j 国的价值链结构发生变化对拉动值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j 国一单位产出中消耗 i 国中间品的比例;消费需求变动效应和投资需求变动效应都属于最终产品需求变动效应,最终产品需求为 j 国通过

不同方式吸收包含 i 国增加值的最终产品,最终产品需求的变动效应表示 j 国的最终需求变化对 i 国拉动值的影响。

#### (四)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OECD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ICIO)作为基准数据库,该投入产出表包含 38 个经合组织国家、28 个非经合组织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RoW)1995—2018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首先将上述 ICIO 的所有国家重新划分,根据各个经济体与拉美的经济贸易关系,将所有国家划分为拉美、中国、美国、欧盟、东盟、日韩和其他所有国家 7个部分。其中,拉美地区包含 7 个主要的拉美国家,它们分别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秘鲁。根据 UNCTAD 的数据显示,2020 年这 7 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占整个拉美地区的 82.1%<sup>②</sup>,可以用来代表整个拉美地区。欧盟为包括英国在内的 28 国,东盟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 10 个成员国。

#### 二、测算结果及分析

(一)中国与外部经济体最终需求对拉美拉动率的比较

使用上文所述的方法,可以计算 1995—2018 年中国、美国、欧盟等外部经济区域最终需求对拉 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表 2)。表 2 中的拉动率表示 外部经济体增加 1% 的最终需求,所能够拉动拉美 经济增长的程度。

	表 2 1995—2018 年外部经济体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								
年份	中国	美国	欧盟	东盟	日韩				
1995	0.001 4%	0.054 9%	0.023 8%	0.003 4%	0.009 0%				
1996	0.001 7%	0.059 2%	0.021 9%	0.002 8%	0.008 7%				
1997	0.002 8%	0.061 0%	0.020 1%	0.002 5%	0.007 6%				
1998	0.001 6%	0.064 6%	0.020 6%	0.001 6%	0.006 2%				
1999	0.001 6%	0.083 2%	0.022 8%	0.002 1%	0.007 1%				
2000	0.002 6%	0.090 9%	0.022 6%	0.001 8%	0.007 8%				
2001	0.002 9%	0.090 4%	0.022 7%	0.002 0%	0.007 0%				
2002	0.004 0%	0.104 9%	0.024 9%	0.002 3%	0.007 9%				
2003	0.006 0%	0.104 0%	0.028 7%	0.002 4%	0.008 4%				
2004	0.007 0%	0.104 5%	0.031 5%	0.002 8%	0.010 1%				
2005	0.007 4%	0.100 2%	0.030 9%	0.002 9%	0.010 0%				

表 2 1995—2018 年外部经济休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

44	$\sim$
231.	,

年份	中国	美国	欧盟	东盟	日韩
2006	0.007 9%	0.097 9%	0.032 2%	0.002 9%	0.010 4%
2007	0.009 0%	0.085 1%	0.034 3%	0.003 1%	0.010 0%
2008	0.010 9%	0.076 8%	0.033 9%	0.003 1%	0.009 7%
2009	0.011 6%	0.065 7%	0.027 3%	0.002 9%	0.008 0%
2010	0.014 6%	0.065 6%	0.025 9%	0.003 5%	0.009 4%
2011	0.017 9%	0.065 9%	0.026 7%	0.003 9%	0.010 5%
2012	0.017 7%	0.067 0%	0.024 9%	0.004 1%	0.009 9%
2013	0.018 3%	0.065 6%	0.023 0%	0.004 2%	0.008 7%
2014	0.019 3%	0.068 5%	0.022 7%	0.004 3%	0.008 4%
2015	0.020 2%	0.078 3%	0.022 0%	0.004 5%	0.008 4%
2016	0.021 4%	0.080 7%	0.022 8%	0.004 6%	0.008 1%
2017	0.023 4%	0.078 6%	0.022 5%	0.004 8%	0.008 6%
2018	0.025 3%	0.088 2%	0.024 3%	0.005 2%	0.014 3%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自行计算。

第一,从整体来看,1995—2018年,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大幅增长。虽然中国在1995年对拉美的拉动率仅为0.0014%,但到2018年,中国对拉美的拉动率已经超过了欧盟,为0.0253%,较1995年增长了17倍,在所有外部经济体对拉美的拉动率中,仅次于美国。这表明中拉之间的经济联系在21世纪之后持续增强,各领域的经济往来都保持着长久且稳定的发展。此外,美国对拉美的拉动率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这表明美国依靠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经济体量与拉美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第二,中国、美国、欧盟、东盟和日韩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分化明显(图1)。如图1所示,外部经济体对拉美的拉动率在2009年之前都存在一个明显的上升和下降趋势,并在2009年形成一个拐点,其中以美国和欧盟的波动较为突出,中国

的波动并不明显,这主要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有关。金融危机之前,全球价值链主要以发达国家 主导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为核心,发展中国家扮演着 加工制造的角色。由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 全球经济衰退,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受到严 重冲击,叠加近年来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美 欧等发达国家与拉美的经济联系不如 2008 年之前 紧密,所以这些国家在 2009 年之后对拉美的拉动 率普遍低于 2008 年之前的峰值。为缓解全球金融 危机带来的影响,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开始寻求更加 灵活、多元化的供应链策略,将生产和服务环节分 散到不同的地区,以此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稀 释风险。这些变化导致全球价值链的碎片化和去中 心化。中国作为拉美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之 一、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逐年稳步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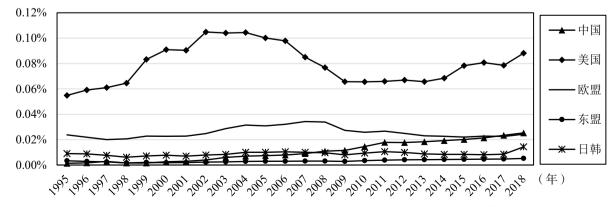


图 1 1995—2018 年外部经济体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拉动率的趋势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自行计算。

第三. 域外价值链依存度也存在差异性。拉动 率的价值链依存度是指外部经济体对拉美的拉动率 中由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参与的部分。表 3 列出了 各外部区域依存度的具体数值,其中拉美的价值链 依存度均处于45%以上。结合拉美工业化程度有限 和丰富资源禀赋的背景,可知初级产品是拉美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贸易产品, 其作为原材料和中间 产品,通过全球价值链链条传送到世界各地,并进 一步被加工为产成品, 因此整体而言拉美的产业结 构严重依赖初级产品。而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的拉 动率中价值链依存度普遍较高,上升趋势明显,在 2000年之后迅速上升至80%以上,并始终高于美国 和欧盟, 这表明中国对拉美的拉动效应主要通过基 于全球价值链的初级产品贸易体现。此外,表3中 的依存度可以分为3个区间,中国和日韩居于高位, 欧盟和东盟居于中位,美国居于低位。

表 3 外部经济体对拉美经济增长的 拉动率中价值链依存度占比

年份	中国	美国	欧盟	东盟	日韩
1995	65.43%	52.37%	61.96%	55.55%	73.30%
1996	59.73%	51.74%	62.30%	63.60%	75.36%
1997	75.03%	51.41%	62.32%	62.92%	75.95%
1998	63.43%	49.29%	62.06%	62.93%	73.02%
1999	67.34%	49.97%	62.16%	59.01%	72.71%
2000	71.46%	50.32%	63.88%	64.24%	75.00%
2001	70.74%	47.83%	63.65%	59.70%	74.08%
2002	68.75%	47.83%	63.24%	61.27%	75.07%
2003	71.43%	48.87%	62.54%	60.76%	76.62%
2004	75.05%	50.63%	63.35%	61.89%	76.18%
2005	79.67%	53.34%	64.94%	63.42%	78.25%
2006	82.18%	54.35%	66.88%	66.00%	80.40%
2007	83.53%	54.79%	68.06%	65.46%	81.92%
2008	80.83%	57.49%	67.86%	67.85%	81.33%
2009	83.79%	53.95%	64.45%	64.85%	81.26%
2010	86.06%	55.59%	67.06%	68.31%	83.72%
2011	85.90%	58.67%	70.18%	66.41%	84.71%
2012	85.92%	56.66%	69.45%	65.66%	81.32%
2013	85.83%	55.25%	69.43%	64.52%	80.98%
2014	84.73%	53.77%	68.86%	64.23%	80.71%
2015	83.63%	50.05%	66.77%	64.47%	79.93%
2016	82.05%	48.64%	64.34%	62.56%	78.54%
2017	82.96%	49.51%	65.01%	63.38%	79.82%
2018	81.96%	50.03%	64.31%	65.11%	84.43%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自行计算。

反之, 拉美对中国的传统贸易依存度较低。根据 UNCTAD 数据库的数据<sup>33</sup>, 2021 年拉美向中国出口的产成品为 86.63 亿美元, 向美国出口的产成品为 3 735.49 亿美元, 向欧盟出口的产成品为 264.30 亿美元。由此可知, 拉美对中国的产成品贸易量相对较少。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 拉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通过产成品增加值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力有限; 第二, 由于拉美所处的地缘政治区位,其与北美洲和欧洲有天然的贸易优势,从而减弱了拉美与中国的产成品贸易联系; 第三, 拉美与中国都是发展中经济体,贸易供需结构存在重合部分,导致双方在产成品贸易方面联系较弱。

总的来说,通过上述拉动率分析,能够得出结论:第一,中国对拉美的拉动率自 1995 年以来大幅增长,从 0.001 4% 提升至 0.025 3%,中拉之间的经济联系显著增强。第二,外部经济体对拉美的拉动程度分化明显,存在差异性。其中,中国对拉美的拉动率波动幅度较小,拉动值逐年稳定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逐渐成为拉美稳定可靠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第三,域外价值链依存度也存在差异性。其中,中国对拉美的拉动率中价值链依存度普遍较高,上升趋势明显,并且在 2000 年之后迅速上升至 80% 以上。拉美正在通过提供初级产品的方式,积极参与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价值链中。

#### (二)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动力分解

更进一步,对上述拉动效应进行动力分解,可以得到表 4。表 4 中各数值为不同时期变动效应的均值。从 1996—2018 年的整体来看,各外部区域的增加值变动率基本为正,中间产品结构变动效应正负各异。分时间段讨论,在 2010 年之前,不论是传统贸易还是全球价值链贸易,各外部区域的增加值率变动效应都普遍为负,2010 年之后则相反,增加值率变动效应普遍为正。这表明 2010 年之后拉美在全球传统贸易与价值链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同时,不论是 2010 年之前还是之后,直接拉动下的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均远远小于间接拉动,这说明拉美通过初级产品与外部经济体建立了较深的联系,但产成品贸易联系较弱。除了日韩地

区全球价值链贸易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较强,其他各地区的最终需求变动效应都显著大于增加值和

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这表明最终需求在整体拉动效应中占据决定性地位。

表 4 外部经济体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动力分解(单位:百万美元)

			美国	中国	欧盟	东盟	日韩
		增加值率变动效应	-23.45	10.91	12.60	4.39	1.53
	传统李嘉图	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	-224.39	-26.82	-62.84	-13.18	-13.78
	直接拉动	消费需求变动效应	2 997.07	552.72	645.21	179.21	151.90
1007 2010 年		投资需求变动效应	3 585.89	270.29	392.98	62.27	107.31
1996—2018年		增加值率变动效应	15.88	69.15	34.33	9.23	16.51
	全球价值链	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	1 272.14	-441.40	625.68	34.25	1 601.88
	间接拉动	消费需求变动效应	3 896.98	2 236.26	902.70	308.25	123.12
		投资需求变动效应	985.68	1 886.64	322.36	144.78	30.94
		增加值率变动效应	-257.64	-0.13	-28.57	-1.89	-7.83
	传统李嘉图	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	150.88	1.99	15.53	0.60	3.17
	直接拉动	消费需求变动效应	2 088.38	258.20	867.14	64.90	69.05
1007 2000 年		投资需求变动效应	2 148.98	123.98	395.53	6.22	16.99
1996—2009年		增加值率变动效应	-209.09	19.10	-41.21	-1.36	-14.79
	全球价值链	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	1 460.66	424.43	836.59	-16.84	662.35
	间接拉动	消费需求变动效应	3 378.31	840.77	1 320.79	185.57	191.33
		投资需求变动效应	418.22	870.25	333.00	60.19	-63.20
		增加值率变动效应	340.84	28.08	76.64	14.17	16.10
	传统李嘉图	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	-808.15	-71.64	-184.74	-34.60	-40.16
	直接拉动	消费需求变动效应	4 410.59	1 010.86	299.98	357.02	280.79
		投资需求变动效应	5 821.08	497.88	389.03	149.46	247.80
2010—2018年		增加值率变动效应	365.84	147.01	151.83	25.71	65.20
	全球价值链	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	978.89	-1 788.24	297.60	113.73	3 063.37
	间接拉动	消费需求变动效应	4 703.81	4 407.02	252.35	499.09	17.01
		投资需求变动效应	1 868.41	3 467.69	305.80	276.36	177.39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自行计算。

从中国增加值率变动效应的角度来看,整个样本周期内的增加值率变动效应均值为正,其中传统贸易模式下为 1 091 万美元,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下为 6 915 万美元。这表明不论是传统贸易还是全球价值链贸易,拉美参与中国价值链的竞争优势都在持续上升,并且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下的拉美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要高于对美国和欧盟。拉美在中国全球价值链"朋友圈"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在中国对拉美的中间品投入变动效应中,1996—2009 年为正值,2010—2018 年为负值。这表明,自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积极与拉美开展基于初级产品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双边原材料和中间品贸易逐年增长。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进

入产业升级阶段,面向全球的生产网络不断扩张, 生产链条逐渐变长,经济体量巨额提升。作为"世 界工厂",中国产出中包含拉美中间产品的比例逐 渐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对拉美经济的 拉动效应。

从中国最终产品需求变动效应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下的变动效应远远大于传统贸易模式。并且,2010年之后中国的需求变动效应显著上升,表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拉价值链合作进一步增强。其中,2010—2018年中国消费需求变动效应为440702万美元,仅次于美国,而中国投资需求变动效应为346769万美元,位居第一。这表明中国的内需对于拉动拉美经济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消费与投资市场在中拉经贸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不断升级的消费、投资需求成为拉美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总而言之,通过对中国的拉动率进行动力分解,发现在中国对拉美的拉动效应中中国最终需求占据着决定性地位,并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下的需求拉动效应远大于传统贸易模式。这与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相吻合,即中国的内需增长不仅能够提升本国的经济增长,还能够通过全球价值链显著拉动拉美经济增长。

###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在世界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 OECD1995—2018 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中国与其他外部经济体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并分别从传统李嘉图贸易的直接拉动和全球价值链贸易的间接拉动两个角度对拉动率进行了具体分析。更进一步,本文对导致拉动率变化的原因进行动力分解,阐明了中国对拉美经济拉动效应变化的决定因素。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自 1995 年以来,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显著增长。1995—2018 年,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持续上升,每 1%的最终需求拉动率由 0.001 4% 提升至 0.025 3%,增长了 17 倍。2018 年中国的拉动率在所有外部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这表明中国对拉美的经济影响力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持续增强。

第二,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中价值链依存度整体较高且上升趋势明显。2000年之后该依存度始终保持在80%以上,并自2010年起普遍高于其他外部经济体。2000年之后,中国每1%的最终需求拉动率中,有80%以上都源自价值链的贸易模式。换言之,在中国与拉美的两种贸易模式中,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拉动率始终高于传统李嘉图贸易,这表明价值链合作是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拉美对中国的价值链贸易主要依托于初级产品出口驱动,拉美将初级产品作为原材

料和中间品投入全球价值链中,经外部经济体加工 为产成品,并最终由中国吸收。

第三,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变化主要由最终产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决定。具体而言,中国最终产品需求对拉动率有决定性作用,并且消费需求的变动效应大于投资需求。这表明,中国的内需增长不仅能够提振本国经济,而且还能够通过国际循环为拉美国家提供发展机遇。

#### (二)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这意味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根本保障,也是畅通国际循环的原动力;而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反过来也将提升国内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本文分析了中拉经贸合作的特征事实和内部动力,这为未来中拉深化价值链合作、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第一,以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从本质上讲,"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这契合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也将为双方参与全球价值链奠定基础。除价值链贸易合作上的巨大优势外,中拉双方还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融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这种从潜力优势向现实效能的转化反过来也将提升我国国际循环的效率。

第二,以科技创新提高中拉价值链合作的深度。当前,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已经从原来集中于能矿领域向农业加工业、制造业、数字经济、服务业等多元领域拓展,这一趋势为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创造了巨大空间。尤其是双方进一步推进在智能制造、高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将显著提高中拉合作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因此,以科技创新合作为驱动不仅能有效提升中拉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以及发掘中拉价值链合作的深度,而且还能有效提升我国国际循环的质量。

第三,以高水平制度开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促进高水平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 点。在拉美方向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双边层次上,继续与潜在国家开展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目前我国已经与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多边层次上,应加强与南共市、太平洋联盟等次区域组织的对话和沟通;在整体合作层次上,继续完善中拉论坛合作机制。这些举措有利于进一步激发贸易投资合作潜力,也有利于拓宽和深化价值链合作的范围和深度。与此同时,中拉价值链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为开拓第三方市场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中拉经贸合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果。 站在新阶段的起点,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 中国仍需要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通过共建"一带 一路"、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促进高水平制度开放 来提升中拉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以及增强中拉 价值链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的目标。

#### 注释

- ①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官网,https://unctadstat.unctad.org/。
- ② 作者根据 UNCTAD 数据库数据计算,https://unctadstat.
- ③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官网,https://unctadstat.unctad.org/。

#### 参考文献

- [1] SAMAKE I, YANG Y. Low-income countries' linkages to BRICS: are there growth spillovers?[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4(30): 1–14.
- [2] 袁畅. 中国与拉美区域价值链重构与产业合作研究[D]. 北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21.
- [3] 蔡昉. 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6): 4-18+155.
- [4] FLEMING J M. 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J]. Staff Paper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62: 369–380.
- [5] MUNDELL R A.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3(4): 475–485.
- [6] DOUVEN R, Peeters M. GDP-spillovers in multi-country models[J]. *Economic Modelling*, 1998(2): 163–195.

- [7] 胡敏, 王铮. 基于 GDP 溢出理论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分析[J]. 技术经济, 2015(1): 125-131.
- [8] SIMS C A.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80: 1–48.
- [9] GARRATT A, LEE K, et al. Global and National Macroeconometric Modelling: A Long-Run Structural Approach[J]. Oup Catalogue, 2006, 156(2): 215–217.
- [10] 于翠萍, 王美昌.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互动 关系——基于 GDP 溢出效应视角的实证分析[J]. 亚太经济, 2015(6): 95-102.
- [11] GEREFFI G, KAPLINSKY R. Introduction: globalisation,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J]. *IDS bulletin*, 2001(3): 1–8.
- [12] 王继源, 陈璋, 龙少波.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的实证分析——基于多部门投入产出视角[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2): 11-19.
- [13] 张同斌, 王树贞, 鲍曙明. "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分解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11): 81-97.
- [14] 倪江飞, 王志雄, 祁卓娅, 吴怡. 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贡献度研究[J]. 中国经贸导刊(中), 2019(3): 18-21.
- [15] 戴翔. 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中国贡献: 基于新框架的测算[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11): 45-56+135-136.
- [16] 古柳, 戴翔.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基于全球投入产出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8): 94-105.
- [17] 戴翔. 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中国贡献: 基于新框架的测算[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11): 45-56+135-136.
- [18] 丁纯, 蒋帝文. 投入产出视角下德国经济增长对维谢格拉 德四国经济影响的分析[J]. 德国研究, 2021(2): 4–18+132.
- [19] 黄仁全, 李村璞.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及增长动力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8): 80-99.
- [20] 张勇, 史沛然.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中拉经贸合作机遇: 全球价值链视角[J]. 太平洋学报, 2018(12): 35-46.
- [21] ARTEAGA J C, CARDOZO M L, et al. Exports to China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unequal effects within the regio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0(164): 1–17.
- [22] KOOPMAN R, WANG Z, et al.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2): 459–494.
- [23] WANG Z, WEI S J, et al.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 The Pulling Effect of China's Final Demand on Latin American Economy

# —Based on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KOU Mingdong<sup>1</sup>, ZHANG Yong<sup>2</sup>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01, China;
2.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not a closed domestic circulation, but an op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With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Chin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Latin American economy is deepening. In view of this,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pull effect of China's final demand on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and the world input-output model,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OECD World Input-Output Table to measure the demand-pulling effect of China on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first, from 1995 to 2018, China's demand-pulling rate to the Latin American economy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0.0014% to 0.0253% per 1% of economic growth, an 17-fold increase, and China's pull rate in 2018 is second only to the United States among all external economies; second, the value chain dependence of China's pull rate to Latin America is relatively high on the whole, with an obvious upward trend, always remaining above 80% after 2000; third, China's final demand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the change of China's pull effect on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effectively drive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to the external circulation.

**Keywords:** demand-pulling effect, China-Latin Ame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global value chain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